

SHUFAXINJIAN

书法新鉴

主编 杨宗兵

石鼓文新鉴

杨宗兵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SHUFAXINJIAN

书法新鉴

主编 杨宗兵

石鼓文新鉴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西安 北京 广州 上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法新鉴:石鼓文新鉴/杨宗兵著. —西安: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2005. 6

ISBN 7-5062-6907-4

I. 书… II. 杨… III. ①汉字—演变—研究②汉字—书法—研究—中国 IV. ①H12②J2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7762 号

书法新鉴

主 编 杨宗兵
著 者 杨宗兵
责任编辑 冀彩霞 王新民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地 址 西安市南大街 17 号

邮 编 710001

电 话 029-87259676 87233647(发行部)
029-87232980(总编室)

传 真 029-87279675

E-mail wmcxian@Public.xa.sn.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27.8

字 数 60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62-6907-4/H·564-1

定 价 60.00 元

☆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本公司更换☆

前言

文字是人类迈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书法艺术是伴随着文字的出现、演变而发展、繁荣的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和其他语言形式相比,汉字书法艺术的历史源远流长,生命长盛不衰。在纸还未出现和普遍使用之前,汉字书写史上曾使用过不同品类的载体,如:甲骨、青铜器、玉石、简牍、丝帛、瓦当、货币、陶器、封泥、玺印等,这已从地下出土的实物资料得到了证实。

19世纪末以来,我国出土的文物数量浩如烟海、品种繁多、材料丰富,这些丰富的材料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专家、学者分别从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文字学、书法学等角度去研究、探索,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研习书法的大有人在,但囿于识见,对于文字学,特别是古文字学知识了解甚少,致使临写、创作的作品徒具其形,而缺少一种历史的沉淀感和文化的厚实感。而研究文字的学者,由于种种原因,往往无暇或不屑顾及书法和书写因素,从而使得汉字的书法艺术传统,特别是汉字在隶变以前古文字阶段的艺术特质无法突破历史的尘埃放射出应有的光芒。

我们秉承“普及文字知识,弘扬书法艺术”的宗旨,本着将这一批批见证中华文明发展历史的出土文物精品,从文字演变和书法鉴赏的新角度,通俗易懂地介绍给普通读者和一般的文字书法爱好者,从而更大地发挥出土文物自身的价值,展现中华几千年灿烂的文明之目的,特地编写了《书法新鉴》丛书。其特点有三:

一、新材料。尽可能基于出土文字实物“第一手”资料来分析、阐述,重点依据一些新出土的、重要实物材料。力求论有实据,实事求是,重材料,不空言。

二、新视野。重视从汉字形体演变和书法艺术鉴赏两个角度综合进行探索、阐述,既有一般性的知识介绍、名家趣闻逸事等,也有作者独到的新见解和学术新观点。以文字载体、书写品类为纲,更兼顾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草书等书体形式,力求融知识性、学术性、通俗性与可鉴赏性于一体,图文并茂,雅俗共赏。

三、新文风。本套丛书共六册,主要由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文字学、书法学专业一批年富力强、才思敏捷的博士担当具体的编著任务,同时非常荣幸地约请到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志基老师参与丛书的编写。本套丛书力求文风清新,文字洗练,短小精悍,可读性强。

如果本套丛书的出版,能为广大的书法爱好者、文字研究者以及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读者带来一些新的思想触动和新的阅读感受,那将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由于作者水平有限,本丛书的编写难免会有不妥,甚至错误之处,敬请有关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书法新鉴》编委会

2005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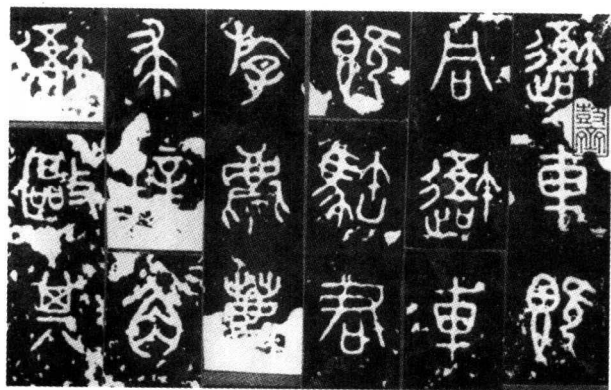
目录

第一章	石鼓概况	2
	第一节 称谓	3
	第二节 形制	5
	第三节 迁徙	7
	第四节 存字	10
	第五节 序次	12
	第六节 石鼓诗	14
第二章	石鼓文摹拓刻印	23
	第一节 拓本	25
	第二节 摹刻本	29
	第三节 临写本	31
	第四节 影印本	33
	第五节 伪本	34
第三章	石鼓文研究简史	37
	第一节 历代石鼓文研究分期	40
	第二节 关于石鼓制作缘由的研究	44
	第三节 关于石鼓文年代的研究	45
	第四节 近二十年来石鼓文年代研究最新成果	54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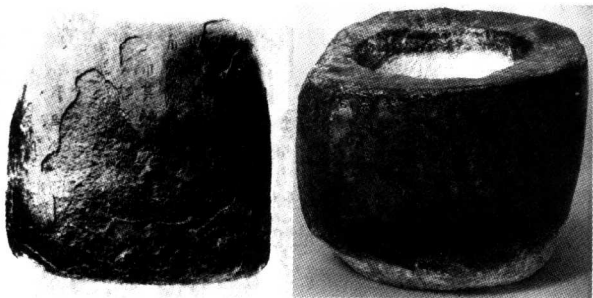
第五节 小结	56
第四章 石鼓文书法风格	63
第一节 点画用笔——典型“圆笔”风格篆法	66
第二节 结体取势——典型“上紧下松”篆书范式	67
第三节 章法布局——典型“均衡和谐、规整简明”章法楷式	71
第五章 石鼓文形体特征	79
第一节 理性建构意识增强，规整性、匀称化程度高	82
第二节 沿袭晚周规整文字的风格和传统，呈现“结构繁复”“造意古朴”“崇古尚典”的烙印和痕迹	88
第三节 折射字形演变“时代性信息”，体现“变化灵活”的特质	95
第六章 石鼓制作缘由及其年代新考	97
第七章 石鼓题咏诗选	119
附录一 石鼓文宋拓《先锋本》缩印本	133
附录二 石鼓文研究论著目录	147

第一章



石鼓概况

今天的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着被誉为“中国第一古物”（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的十枚石鼓。



“汧谿”鼓

“田车”鼓

石鼓，唐代初年（约627—649年）出土于陈仓（今陕西省宝鸡县），历经数千年的风风雨雨，原石尚存，原貌依旧，依稀可见当年风采，为今人所瞻仰，堪称中华国宝、千古绝响。首先介绍一下石鼓的称谓、形制、迁徙、存字、序次以及石鼓诗的内容。

第一节 称谓

关于这组文物，历来有多种称谓，主要有“石鼓”、“猎碣”、“石碣”、“秦刻石”、“秦雍邑刻石”等，如：唐代李贤

第一章 石鼓概况

《后汉书注》因为石的形状像鼓，四周刻字古拙而称之为“石鼓”；宋代董道《广川书跋》等根据古人“武事刻于钲鼓”的做法也称之为“石鼓”。二人虽然都同称为“石鼓”，但是依据略有不同。诗人杜甫在《赠李潮八分小篆歌》中称为“陈仓石鼓”，原诗句为“陈仓石鼓久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石鼓和石鼓文考略》（胡建人，1994）一文沿用杜甫的称呼：“确切地说，应该叫‘陈仓石鼓’，既明确了石鼓的归属，又明确了所指为陈仓何物。”

唐代贞观年间吏部侍郎苏勔“打本”（即拓本）石鼓《叙记》、窦蒙《述书赋》注等因为石文记叙的内容多为周宣王渔猎生活等事迹而名为“猎碣”；明代郭宗昌《金石史》“辨其制以为非鼓”，所以又重新命名为“石碣”。《石鼓与籀文》（潘振允，1983）、《秦刻十碣考释》（罗君惕，1983）等论著或称为“秦碣”，或称为“碣石”，取意于“方者谓之碑，圆者谓之碣”。《石鼓文疏记》（马叙伦，1935）一文以文字、形制考之而定名为“秦刻石”；《中国文字学》（唐兰，1979）仿照秦刻石通称泰山刻石、会稽刻石等惯例，以为石鼓出自于天兴县（今凤翔一带）而称为“秦雍邑刻石”……除了以上诸多称谓外，历史上还因石鼓自秦代灭亡以后一直委弃在陕西凤翔以南、陈仓之野，故又有“陈仓十碣”之称；又因其地在岐山之阳，有时也称为“岐阳石鼓”。



“十鼓斋”石鼓文宋拓（部分）

石鼓的称谓虽然名目较多，但使用最广泛、叫法最普遍的还是“石鼓”两个字：世人一般都因为石状像鼓形而通称为“石鼓”，这是最耳熟能详的俗称，也是沿用历史最久、最广为人知的称谓。在这里，我们沿用唐代李贤《后汉书注》等“石鼓”之称，并称刻在石鼓上的文字为“石鼓文”。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之一。

第二节 形制

石鼓一共有十枚，外形似鼓，上窄下宽，圆顶平底，四周圆而见方，中腰微微外凸，一般直径有1尺多，高3尺左右，十枚石鼓形状、高低、大小略不相同，都有文字环刻于鼓腰四周，因为年代久远，石鼓文字多有剥泐，漫漶不清。

我们根据《石鼓文释存》（张燕昌，1788）等论著的有关记载，简要描述十枚石鼓的形制及其刻辞的情况。每只石鼓的定名，仿照《石鼓文研究》（郭沫若，1939）一书的体例：“悉仿《诗》序，标举文中二字以为石之名”，个别稍有改动。

“车工”石：高1.7尺，围6.6尺，字径0.1尺。文11行，行6字。

“汧毆”石：高2.1尺，围6.3尺。文9行，行7字，末行5字。

目前，10枚石鼓中只有此石完好无缺，“汧毆”石第5行下2寸左右有一赘文，一般释为“奠”字。

“田车”石：高1.8尺，围6.4尺。文10行，行7字，末行6字。

“璿车”石：高2尺，围7.3尺。文10行，行7字，末行6字。

“霈雨”石：高2.1尺，围6.8尺。文11行，行6字。

“乍原”石：高1.5尺，围6.8尺。文11行，据《石鼓文考释》（罗振玉，1916）“行7字，末行4字”。

“乍原”石在十枚石鼓中高度最矮，是北宋皇祐年间向传师在民间四处搜访所得，上顶已经被截去凿空制成了舂米用的石臼。现存“乍原”石每行剩余4字，末行剩余1字。关于“乍原石是否北宋当年向传师所访得之石”曾有过争议：南宋施宿认为：“此鼓为向传师皇祐间所搜访而得之者，每行仅存四字，自四字而上磨灭者，向传师磨去，刻当时得之之由。故今所存者，皆断续不成文”。清代张燕昌根据北宋石鼓文拓本向传师跋：“传师详览内第十鼓（即‘吴人’石）最小，其文亦不相类”，后访得一鼓，“遂易而置之，其数方备”，认为“传师所得之者是第十鼓（即‘吴人’石），非第六鼓（即‘乍原’石）”。郭沫若先生从南宋施宿说，并且认为，向传师访得原石以后，曾经用石补全、复原，并在上面刻记有关事由，只是向传师所补之石，不知何时又被剔去，所以此鼓仍呈白形。郭沫若先生进一步猜想：“乍原石于传师获得之前，盖曾另制一石以代替之，并刻文于其上，此代替之石及传师所补半石，意必尚存于人间。”今天看来，南宋施宿之论当有所本，郭沫若先生的猜想已无从证实。但有一点可以十分肯定：“乍原石”曾散落于民间被制成了舂臼，故成白形。

“而师”石：高2.2尺，围6.7尺。据《石鼓文研究》（郭沫若，1939）“文11行，行6字”，末行3字。关于“而师”石“文×行，行×字”，学术界仍有争议：吾衍《秦刻石释音》作“文10行，行7字”；《石鼓文考证》（吴广需，1931）：“以大张全拓细审之，‘而’字前尚有偏旁残画……此鼓当是11行（行7字）无疑，‘而’字已列在二行，余亲验石本如此。”《石鼓文疏记》（马叙伦，1935）同意吴广需的观点。《石鼓文考释》（罗振玉，1916）作“10行6字”；《石鼓文研究》（郭沫若，1939）作“文11行，行6字”，郭沫若先生依所存文字的空间位置进行测算：“每行只能容6字，末行‘古’字之残画已在石缘直下，行首再添一字必将上顶”，而“通观十石，无于顶上刻字之例。”郭说当可信。

“马薦”石：高1.6尺，围6.8尺。“马薦”石剥泐最厉害，行数、字数已不可考定。吾衍《秦刻石释音》作“文5行，行5字”；明代顾汝和《顾氏端砚本》曾依据北宋石鼓文拓本摹勒上石，较为可信，我们现依据《顾氏端砚本》作“文8行，行5字”。

“吾水”石：高2.9尺，围7.8尺。文15行，行5字，末行4字。

“吴人”石：高2.1尺，围6.3尺。我们依据石鼓文《甲秀堂本》、《顾氏端砚本》，作“文9行”，行8字。

石鼓由花岗岩石质刻制而成，颜色青黑，质地坚硬、沉重、厚实。据《石鼓文概述》（任熹，1936）一文介绍，石鼓形貌“……石皮与骨率已皱起，作分离状，叩之则声响廓然，中若虚空，椎拓迁移，脱落立见。”

第三节 迁 徙

石鼓出土至今1300余年，其间有过多次迁徙：石鼓在发现之前，一直散落在陈仓（今陕西省宝鸡县）荒野，任凭风吹雨淋日晒，目睹世代变迁、岁月流逝，历经了秦、汉、魏、晋、南北朝，唐代以前无闻于世。唐代初年，人们在陈仓北阪的山上发现了十枚石鼓，消息不胫而走，文人雅士们闻讯后，纷纷前往观赏，并为之吟诗作赋，歌咏赞叹，朝野上下一时为之轰动。当时唐代的有关历史文献都及时著录了石鼓文的情况：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凤翔府天兴县，石鼓文在县南二十里许。石形如鼓，其数有十。……贞观中，吏部侍郎苏勔纪其事。”唐贞观年间（627—649年）吏部侍郎苏勔“打本”（即拓本）石鼓《叙记》：“世咸言笔迹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关中。虞、褚、欧阳共称古妙，虽岁久讹缺，遗迹尚有可观。”李嗣真《书后品赞》：“史籀湮灭，陈仓藉甚。”张怀瓘《书断》：“籀文者，周太史籀之所作也，与古文小异，后

人以名称书，谓之籀文。……其迹有《石鼓文》存焉。盖叙宣王畋猎之所作，今在陈仓县。” 窦蒙《述书赋》注：“史籀周宣王时史官，著大篆，教小学。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猎碣》十枚，并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见打本。” 徐浩《古迹记》：“史籀《石鼓文》。” 唐永徽三年（652年）李贤《后汉书·邓骘传》注：“今岐州石鼓铭，凡重言者皆为=字，明验也。” 石鼓的发现也引起了大诗人杜甫、韦应物、韩愈等的浓厚兴趣，纷纷写诗作赋、歌咏赞叹（详见本书第七章《石鼓题咏诗选》），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等书法大家又“共称古妙”，渐渐地，石鼓名声鹊起，为世人所广泛关注和重视。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石鼓由陈仓北阪迁置当时初设的天兴县（县治设在石鼻城）。据南宋王厚之《复斋碑录》记载，元和初年，诗人韩愈曾经向朝廷的祭酒请求，建议用车将石鼓运到当时的最高学府——长安太学加以妥善保护，但韩愈这样好的意见却没有得到当权者的恩准，韩愈为此感慨良多，曾作长诗《石鼓歌》一首。后来，石鼓在“元和八年（813年）被置于雍城（今凤翔）南二十里许”。元和十三年（818年），郑余庆迁置石鼓于雍城孔夫子庙，一直到唐代结束，陈仓石鼓没有进入长安城。

唐代末年与五代十国时期，战乱纷起，社会动荡不已，石鼓也历遭洗劫，散失到了民间，饱经颠沛流离、人世沧桑。宋代初年，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出任凤翔地方官，细心察访石鼓的下落，终于找回了石鼓，但当时“十鼓已亡其一”，仅存9枚石鼓，用车运回凤翔，安置在府学门庑下，“外以木椳护之”（按：见宋代郑樵《石鼓音序》、黄朝英《靖康湘素杂记》等记载）。北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向传师四处搜访，终于找到了散落的那枚石鼓（即“乍原”石），然而上端已经剝成石臼之形，被制成了舂臼使用，所幸鼓上剩余的遗篆还依稀可见，所以又用此石调换原来仿制的小鼓，十枚石鼓之数乃足。令人感慨的是，“乍原”石失而复得，终成残鼓，因战乱佚亡长达百余年之久。

宋嘉祐六年（1061年）时任凤翔府签判一职的苏轼在孔夫子庙见到了这些石鼓，有感而发作长诗《石鼓歌》一首。宋大观二年（1108年），喜爱金石书画的宋徽宗下令将石鼓自凤翔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当时蔡京筹建辟雍（即太学），将十枚石鼓置于讲堂，这是石鼓得以置于太学的开端，后来辟雍废止，宣和元年（1119年），雅好金石的徽宗皇帝为了便于自己赏玩，又命人将石鼓搬进皇宫内府，置于保和殿稽古阁内。为了显示石鼓的贵重，徽宗又下诏，令人用黄金填涂于石鼓阴刻文字之上（按：马衡先生曾经就石鼓的情状亲自进行考察，认为“填金势有所不能，盖谓以泥金涂入其字。”现在推测当时大概是用金粉末涂在阴刻字中，并非用黄金镶填），并精心配制了座架、围栏等加以保护，不允许再摹拓石鼓文字（按：见宋代胡世将《资古绍志录》、王厚之《复斋碑录》等记载）。

宋靖康丙年（1127年），金兵攻破汴京，石鼓并保和殿的金银财宝和古玩文物被金兵掳掠一空，北渡黄河，被运往燕京（今北京）。在搬运途中，石鼓被金兵剔掉了涂金，再次被抛弃在荒野之中，一百多年无人问津（按：见元代虞集《道园学古录》记载）。金完颜亮正隆三年（1158年）曾经下诏命令将“平辽、宋所得古器”全部销毁（按：见宇文懋昭《大金国志》记载），当时十枚石鼓因祸得福，因早已散落荒野，所以才能够躲逃此劫，幸免于难。

元代初年，燕京开始平定，石鼓又被重新找回、安置在宣抚王楫的私宅，王楫又在旧金枢密院地复创庙学，“仍取旧岐阳石鼓列麾下”（按：见《元史》卷153列传四十《王楫传》记载）。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元迁都城北，在城东别立国子学（即孔庙），将南城庙学作为大都路学（按：见《元史·选举志》记载）。元成宗大德末年（1307年），虞集任路学教授一职，得十鼓于“泥土草莱中，洗刷扶植，足十鼓之数，后助教成均言于时宰”，于仁宗皇庆元年（1312年）将石鼓用车运置城东新建“国子学大成殿门内，左右壁下各五枚，为砖坛以承

之，又为疏桯局辘”。元惠宗至元五年（1339年），国子司业潘迪、国子祭酒欧阳元等“间取郑樵、施宿、薛尚功、王厚之等数子之说，考订其音训，刻石侧诸鼓右”（按：见元潘迪《石鼓文音训碑》记载，原碑今存北京成贤街首都博物馆）。据郭宗昌《金石史》记载，明清两代，十枚石鼓均存放在燕京国子监，然而护持无人，没有得到很好地保护，动则篝火摹拓，石鼓不断地脱落、剥泐。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高宗为了更好地保护原石鼓，曾令人仿刻了十鼓，放置于辟雍（太学），现仿鼓仍存北京国子监，其形状与刻字部位和原石鼓有不少的差异。

民国初年，曾用玻璃匣罩于石鼓之上，外竖栅栏以慎保藏。后来国子监成为故宫博物院的分院，石鼓犹存原所。1933年，日军威胁北平、天津，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著名的考古学家马衡先生奉命主持石鼓等古物南迁，“就石之存字者，以纸糊之，更缠以枳纆，裹以絮被，外函木箱”，石鼓曾一度存放在上海多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了保护国宝不落入侵略者之手，石鼓又由专人护送，由上海迁运至四川重庆、峨眉等地，辗转各地，费尽周折。抗战胜利后由南京终于运回北京，于1958年开箱，陈列于故宫博物院旧箭亭至今。

第四节 存 字

石鼓经岁月变迁和屡次迁徙，文字脱落、剥泐较甚，各时代人所见字数已有多少之别，据清代《石鼓文定本》（沈梧，1890）记载：孙巨源于佛龕中得唐人录本497字；范钦天一阁北宋本462字，薛尚功（《历代钟鼎款识法帖》）所录451字，欧阳公《集古录》所见465字，赵夔所见417字，胡世将《资古录》474字，赵古则云：吾丘衍比《资古录》又加3字，共477字；《庚子销夏记》云：吾衍参考得430余字；林侗所藏宋淳化间李穀摹本450字；潘迪（《石鼓文音训》）所见386字，刘梅国《广文选》所录与潘迪同，而都穆《金薤篇》云：刘梅